

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的发展述评

周新国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历史学学科建设成绩显著,科研成绩斐然。江苏史学人在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专门史研究以及考古学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界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研究历史,关注现实;踏实严谨,不图虚名;与世界史学对话,推动学术交流;奖掖青年学者,重视团队建设。江苏历史学发展成绩的取得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这些成绩是江苏史学工作者“史才”“史识”的体现,也反映出江苏史学工作者坚持“求真”“求是”及坚守“史德”操守。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江苏史学 学科建设 科研成果

周新国,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学教授 225000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江苏史学界和全国学术界一样,冲破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束缚,拨乱反正,走出了“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迎来了江苏史学和中国史学发展的春天。

1979年,江苏史学界同仁率先承办了“中国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全国史学界召开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开展学术讨论的一件标志性大事,在中国史学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茅家琦等学者为此次会议的召开多方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对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起巨大支撑作用的江苏历史学,经过40年的发展,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呈现一派繁荣。

一、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历史学学科建设与科研成绩显著

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历史学学科建设成绩显著。截至2018年,江苏历史学有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两个,即均由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及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另

[1]《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北京〕《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有江苏省高端智库一个,即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

目前,江苏历史学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6个,即南京大学中国史、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苏州大学中国史、扬州大学中国史、苏州大学世界史及南京大学考古学;有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8个,即南京大学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苏州大学中国史、世界史,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世界史和扬州大学中国史;有省级重点学科6个,其中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和扬州大学的中国史为江苏省“十二五”一级重点学科,江苏师范大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为省级重点学科培育点。

依托学科建设的发展,江苏历史学出现了一批在海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历史学科研成果斐然。江苏史学界承担了一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在中华民国史、中国秘密社会史、太平天国史、中国经济史、江苏区域史、六朝史、苏联史、东南亚史、中外关系史、江苏考古、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江苏口述史等领域产生了众多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同时江苏史学界积极开展事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针对南京大屠杀问题、南海问题、琉球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等重大历史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江苏考古工作成绩喜人,成果涉及长江下游人类和古环境、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史前稻作农业文化区和古稻田、史前治玉、华夏国文明诞生前与周边文化相互关系、西周春秋时期徐夷文化与徐国史、吴越城址和吴城墓葬为代表的吴越文化、西汉诸侯王陵、六朝都城与大型墓葬、唐代扬州城、明代宫城、明代造船厂与功臣墓葬以及明清紫砂窑等领域。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江苏历史学在史学研究各个领域都有一批代表性成果问世。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有顾德融、朱顺龙著的《春秋史》,韩儒林、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许辉、邱敏、胡阿祥等著的《六朝文化》,张承宗、田泽滨著的《六朝史》,王永平著的《六朝家族》,邱敏著的《六朝史学》和李天石著的《中国中古良贱制度研究》等。

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有茅家琦等著的《太平天国通史》(上中下),崔之清著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1—4卷),茅家琦等著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张宪文等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1—4卷)、《中华民国专题史》(1—18卷)等。

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马洪武等著《新四军发展史》《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省委组织部、省党史办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及杨颖奇、张庆军著的《风卷红旗》等。

在江苏地方通史方面,有宋林飞等主编的《江苏通史》(1—10卷),王国平主编的《苏州通史》(1—16卷)以及正在编写的《南京通史》《扬州通史》等。

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秘密社会史方面,有王卫平主编的《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池子华著的《中国近代流民史》,蔡少卿著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车锡伦著的《中国宝卷总目》,朱庆葆等著的《鸦片与近代中国》,吴东升著的《邪教的秘密》和吴善中著的《晚清哥老会研究》等。

在江苏学派和艺术史方面,有申屠炉明著的《常州学派研究》(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田汉云著的《中国近代经学史》,周新国等著的《太谷学派史稿》,徐邈、李玫、张海燕著的《扬州传统漆艺史》等。

在南京大屠杀方面,有张宪文等著的《南京大屠杀史全史》(上中下),张宪文等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72卷),孙宅巍著的《南京大屠杀》,张生著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等。

在人物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该丛书总计200部,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思想家评传的集大成者,也被称为“世纪之交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1]。

[1]吴玫主编:《影像南大:南京大学百年图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3页。

此外还有林林总总的史著,如施元龙等主编的《中国筑城史》,缪咏禾著的《明代出版史稿》,郭孝义著的《江苏航运史》(近代部分),张承宗、魏向东著的《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余明侠著的《徐州煤矿史》,段本洛等著《苏州手工业史》,秦子卿、任兆凤等主编《江苏历代货币史》,江苏钱币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纸币史》,孟建华著的《中国近代货币流通理论与实践》《中国近代货币流通思想与实践》,陈乃林、周新国等著的《江苏教育史》等。

在世界史和民族史方面,有王觉非著的《欧洲史论》,姚海著的《俄国革命》(苏联史第1卷),陈显泗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钱乘旦、陈晓律著的《二十世纪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朱瀛泉著的《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魏良弢著的《叶尔羌汗国史纲》,刘迎胜著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等。

在考古学中方面,有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等编的《尹湾汉墓简牍》,罗宗真著的《六朝考古》,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编著的《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扬州考古所等著的《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等。值得注意的是,江苏考古界为配合沪宁高速、西气东输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淮河入海改造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宁杭城际铁路、沪宁城际铁路、沪宁铁路等国家大型建设工程进行了调查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江苏考古界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方针,有效落实了相关工作。

另外,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正在开展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江苏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历史上第一部江苏文化历史百科全书”^[1],江苏史学界承担了其中相当重要的部分。

二、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界呈现的特点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治史的格言,也是江苏史学界同仁孜孜追求的境界。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界呈现的特点至少有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真理,勇于探索。众所周知,江苏史学界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摧残,一批史学工作者受到迫害,或被批判,或被下放,或含冤致死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历史学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以茅家琦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江苏历史学工作者积极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经过与中国史学会同仁共同筹划,于1979年5月在南京举办了“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方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2],来自全国的200余名学者以及多位日本、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等国家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畅所欲言,积极递交论文,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史学界在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江苏乃至全国史学界学术活动的开展。在张宪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同仁的积极策划推动下,1984年5月在南京召开了“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海内外专家学者200余人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冲破了民国史研究中的禁区,极大地推动了大陆民国史的研究,成为江苏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一标志会议。

第二,关注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努力将学术和实践有机统一。在中外重大历史方面,有韩儒林教授著的《元朝史》、王觉非教授著的《欧洲史论》等。在重大现实问题方面,有蔡少卿教授所著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等。其中,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72卷),是当今世界关于

[1]王燕文:《将“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打造成传世精品》,〔南京〕《新华日报》,2016年3月9日。

[2]《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天津〕《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

南京大屠杀最翔实最全面的史料集,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有力回击”^[1]。

第三,不图虚名,踏实严谨。“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车锡伦教授著的《中国宝卷研究》,是其积数十年辛勤劳作的成果,在宝卷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该著作获得了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另外,分别荣获第十四届、第十五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曹金华的《后汉书稽疑》和刘建臻的《焦循全集》(1—18卷)也反映了作者的这种风格。被评为江苏省首届社科名家的茅家琦、张宪文、蒋赞初、周勋初,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孙江、王卫平,以及众多先后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和被评为国家级、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江苏历史学者都是江苏史学界踏实严谨治学态度的典范。

第四,积极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推动江苏史学走向世界,与世界史学对话。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界一大批学者走出国门,与海外同行交流对话,或共同承办相关国际会议,或合作开展项目研究,或共同编纂学术著作,成为江苏史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江苏史学工作者出席海外国际学术会议已成常态,数量难以统计。一大批学者应邀到海外高校及相关学术机构讲学,或在高层论坛上演讲,同时也有一批海外学者来苏或讲学或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等,成为江苏史学界与海外交流又一渠道。

江苏史学界与海外学者在江苏举办了许多高端的学术会议。其中中国史方面有先秦区域文化学术讨论会、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会议、楚汉文化研讨会、秦汉史国际会议、六朝史学术会议、元史国际会议、中华民国史国际会议、辛亥革命与临时政府国际研讨会、清史国际学术会议等;考古方面有文化遗产保护与古都会议等;世界史领域的国际研讨会涉及美国史、日本史、英国史、苏联史、印度史、东南亚史等;国际关系方面举办了涉及中非关系、中韩关系、中美关系等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涉及人物专题的国际会议有郑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徐福学术研讨会、林则徐学术研讨会、张謇学术研讨会以及马可波罗学术研讨会等;涉及中共党史的有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方面的有扬州学派研究、太谷学派研究、常州学派研究、吴文化研究、徐州汉文化研究、扬州八怪研究等领域的国际会议。

第五,奖掖青年学者,重视青年史学队伍建设。在老一辈史学家的关心奖掖之下,江苏青年史学工作者传承老一代治史的风格,并发扬光大。江苏史学界曾于20世纪80年代召开过“首届全国青年太平天国史研讨会”以及“中国近代化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讨论会”。进入21世纪以来,江苏史学界连续两届举办“江苏青年文史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并进行评奖。2016年11月,江苏史学会和中国史学会、南京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了“首届全国张謇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来自全国的60位青年学者60余篇学术论文,经专家评审共10名青年学者获奖。2018年,南京大学举办了“第二届茅家琦史学论坛”和“首届中国近代史全国青年高峰论坛”。另外,在江苏“三三三”人才工程评选和青年骨干教师评选中,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入选,他们成为江苏史学队伍中最有生气和活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改革开放40年江苏史学发展的历史启示

启示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发展成绩的取得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分不开的。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人文社科

[1]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领域包括历史学领域的投入,使得整个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江苏历史学领域从中受益良多。特别是一系列重大社科项目和文化工程在很大上支持了江苏史学的发展,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抗战史研究专项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边疆研究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中国史学界包括江苏史学界的相关领域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包括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社科联和省社科规划办等部门)40年来持续地支持江苏社科规划项目、重大项目以及学科和基地建设,对江苏历史学的发展推动很大。近年组织的江苏文脉研究和推进工程,更是直接推动了江苏史学的发展。

启示之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尤其是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冲锋号推动了包括江苏史学工作者在内的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史学视野不断扩大,史学研究选题范围、方法使用都发生了变化:从单一政治史研究到多元历史研究;从社会史研究到生态史研究等;从运用唯物史观到运用大数据分析历史等。伴随视野、选题与方法的巨变,江苏史学界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科研成果,从社会史研究、秘密社会史研究到货币史研究、风俗史研究、生态史研究、灾荒史等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的问世体现了江苏史学界或对中国史研究的深入,或对世界史研究的新探索,或对中国历史学理论构建的思考,或对传统历史资料汇纂诠释,或对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都集中反映了江苏史学工作者历史视野、学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和发展,这种新的“史识”的增长和变化,是极其可贵的。

启示之三: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工作者坚持“求真”“求是”,坚守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史德”的操守和底线,在各种错误思潮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努力克服“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的同时,努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40年来,伴随新史学的大幅扩张,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和植入,一些“逐新求异”的所谓“新史学”诉求层出不穷,有些只是西方既成理论框架的添加,有些则只是话语模式的置换。在面对所谓“告别革命”、否定爱国历史人物和歪曲历史史实、诋毁中国革命等错误思潮时,江苏史学界同仁坚持了“史德”操守和底线,或以考订汇纂史料求历史史料的完整、真实,或在大量史料基础上揭示历史事实真相,或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等,以求构建历史学的真实,终极追求就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史学界和我国史学界同仁一道在中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及考古学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令中国学术界和海外学术界瞩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江苏史学成果中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富有创新的著作还不多,江苏史学界提出影响中国和世界学术界的原创性史学理论、方法和概念也不多见。另外,既有学术成果翻译成外文的还远远不够,这都需要江苏史学界今后作出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这对我国史学界的发展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就江苏史学界而言,我们必须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总结江苏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创新,为繁荣和发展江苏历史科学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史拴拴]

[1][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